

介紹学术界討論
孔子和王船山的一些情况

(紀录稿)

金 燦 然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历史教研室

一九六四年四月

中国图书馆界先驱 沈祖荣先生文集

(一九一九——一九四四年)

丁道凡 搜集编注

杭州大學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沈祖荣先生是我国赴美专攻图书馆学的第一人。他回国后，即将所学的专业知识加以改造，使之成为适应中国情况的图书馆学。他是参加国际图书馆第一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当时曾遍访欧洲各国图书馆，撰文传播外国的先进经验。他担任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校长达二十余年，为祖国培训了大量的图书馆专业人材和档案管理人材。本书收集了他于一九一八年至一九四四年期间陆续发表的，但现在不易见到的文章三十一篇。它是我们研究这一时期中外图书馆发展概况、图书馆教育史、档案管理学教育史的重要文献；是今天的图书馆学教育和档案管理学教育很好的教学参考资料；是图书馆、档案馆具体工作的指南。

(浙)新登字第12号

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荣先生文集

丁道凡 搜集编注

*

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杭州天目山路34号)

*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浙江省诸暨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1/32 8印张 3插页 197千字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书号：ISBN 7-81035-033-1/G·019

定 价：4.50元

說 明

金燦然同志于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一日給我校一九五九年班历史专业作了一次介紹学术动态的报告。本稿是根据課堂筆記，并参考有关資料整理而成的，未經本人审阅，請勿外传。

历史教研室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11-14/04

師道長存

紹期先生景表之文華國古蹟學有極二十餘
年舊三十年代余承乏時江省立圖書館幸得
奉交今送凡先生輯其遺著所集讀之益為

感慕念先生桃李滿天下圖書界又教界者皆尚

不稀爰跋題四字為頌

忘孰陳誠忘書時年九十

一九九九年三月

由于工作和业务上的原因，我跟学术界經常有所接触，也参加了一些哲学、經濟、历史、考古等学术活动，所以多少了解一些情况；当然，要說全面、系統，那还是很不够的。今天我就把学术界討論孔子 and 王船山的具体情况向大家介紹一下，也可以說是跟同志們談談“行情”。

孔子学术討論会是山东省历史学会和 山东省 历史 研究所主办的，在去年十一月六日至十二日举行于济南。参加討論会的，有来自全国十六个省市的学者，共計一百六十余人。紧接着孔子学术討論会的，是紀念王船山逝世二百七十周年的学术討論会。那是由湖南和湖北两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于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六日，在长沙举行的。北京、上海、广州、河南等地的少数学术工作者也应邀参加了會議。到会的共有九十多人。

这两次討論会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大体上，山东的会主要就学术討論中的思想問題展开了討論；而湖南的会則主要討論了学术問題。当然，学术問題和思想問題不能截然分开。在孔子討論会上反映出来的思想問題，也还是离不了学术。

孔子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二千多年的影响，到了“五四”时期，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把它打了一下。但以后蔣介石、何健等又把它吹捧了一番，它在知識界的影响仍然不小。据統計，解放以后，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孔子的論文有一百四十篇，約一百一十万字。所以孔子思想是一个討論得比較热烈的問題。在这次孔子学术討

論会举行之前,我們已經看了一些文章,发现有一些問題,主要是有复古主义傾向,存在着超階級观点和非历史观点,也还有人甚至想为孔夫子招魂。赵紀彬、侯外庐、关鋒等同志曾就这些問題交換了意見,并向周揚同志作了汇报。周揚同志的指示有两点:一是不要把学术討論会搞成尊孔会;二是要坚持階級分析。同时还指出:要看到坚持階級分析不是一件輕而易举的事情,需要花費大量的劳动才能解决。正如恩格斯說过的:“唯物主义的認識的发展,哪怕是单单对于一个历史实例,都是一种科学工作,要求多年的冷靜钻研”。(恩格斯:《論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学批判〉》。見《政治經濟学批判》,196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65頁。)到山东以后,我們又向省委作了汇报,研究了會議的开法,和怎样引导會議的方向等問題。

在會議的开幕式上,我們就提出了我們的观点,宣布这是学术討論会,为的是批判地继承我国历史遗产,而不是尊孔,所以必须坚持階級观点。在會議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斗争,在学术討論中暴露了不少思想問題。有人就公开提出階級分析方法对孔子不适用;也有人极力美化孔子,實質上仍然把孔子看成是“大成至聖先师”。面对着这些問題,领导上当然不能不管,听任他們去尊孔。所以山东孔子学术討論会主要是就学术討論中的思想問題展开了討論。

在湖南举行的王船山学术思想討論会,則主要是討論学术問題。王船山与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不相同的。孔子思想在我国統治了二千年之久,“五四”时候打了一下,但并不彻底;以后蔣介石、李宗仁又提倡尊孔,至今在一些旧知識分子中間影响还很大。王船山是明末清初人,在封建社会里受压抑,富有民族气节,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的思想里面有光輝的一面,有好东西,但过去一直被埋沒着,对他的研究很不够。因此这个会主要是討論学术。

当然，孔子討論会上的思想問題也是圍繞着学术問題的，例如，在对孔子的政治主张的看法上，就既有学术問題，也有思想問題。同时，討論的范围也很广，已不限于孔子本身的問題，而且涉及到了研究哲学、历史的方法問題，階級分析和历史主义的关系問題，等等。

比較起来，孔子的問題要复杂一些。由于缺乏深入研究，有些我也搞不大清楚。王船山的問題則比較簡單，討論中的分歧也不很大。我想先讲讲孔、王两人所处的时代，然后分別介紹他們的生平和思想。至于討論中間的一些爭論問題，那就結合着介紹一起談。而在分別介紹情况时，我准备先讲王船山后讲孔子，因为前者比較簡單，好讲一些。

（一）孔子、王船山所处的时代背景

孔子是春秋时代魯国人，他的生卒年代是公元前五五一年至公元前四七九年，活了七十三岁。关于春秋的起迄年代，按郭老主編的《中国史稿》是公元前七七〇年至公元前四七六年，即从平王东迁到周元王元年，前后将近三百年。但也有人直接采取孔子所作《春秋》的起迄年代的，那就是从魯隐公元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七二二年到公元前四八一年，共二百四十多年。此外，也还有以三家分晋（公元前四〇三年）作为春秋的下限的。但說孔子是春秋末年的人，則是没有什么問題的。

王船山比孔子要晚二千年，正处于明末清初的十七世紀，生卒年代是公元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年，活了七十四岁。

这两人所处的时代是不相同的。

关于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的社会性質，目前还有不少爭論。主

有书目印行；常雇工匠，住馆修理。 经费有限，尚未改良。普通券，每人铜元2枚；特别券，每人4枚；妇女券，每人2枚；儿童券，每人1枚。民国六经费1488元 临时费763元

江苏 无锡天上市普通图书馆 汉文13636，日文338，西文38。594人 书籍不能借出 胡壹修 分经史子集、丛书、文学、理学、法学、医学、教育、实业、杂志、日文 装订宜分甲乙丙丁戊五种，大小一律；此外无异式，藏书方能美观 图书证券不取资 每年264元

江苏 松江通俗图书馆 汉文50000本，日文约100本，西文约200本 每年7861人 不借出 馆长雷君彦 分新旧两部。旧籍，依经史子集、丛书编次；新籍，依各科学编次 不取资 本年度1500元

江苏 上海圣约翰学校图书馆 汉文1581，西文10183 7477人 能借出 徐燮元 杜威十类法 不取资 每年2000元

江苏 金陵大学图书馆 汉文2016，西文3141 17906人 书能借出每次不得超过3册 克乃文、洪有丰 西文以美国杜威十类法，汉文仿四库全书目录法 应改良 不取资 附属于学校内，并未规定常经费

江苏 南通学校图书馆 汉文130000卷，日文108册，西文290册 约100人 非馆员特别许可，不能借出 馆长张謇，名誉馆长沙元炳 分经史子集、丛书五大部 装订待研究 每券铜元2枚 南通张謇以私资开办，建筑费13000元 常年经费2000元

浙江 普通图书馆 汉文372188，日文852，西文673 上年每季1603人，本年9月份止，每季2106人 能借出，但有保证金及其他种种条件 龚宝铨 原编目录 照四库分类，新书即附其中，然新旧杂糅，殊嫌不便；明年续编书目，拟旧书仍依库目，新书别为一编；浙江藏书楼，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皆如是，但新旧亦无截然界线；兹事实无善法，非于四部内，别增门类，不能

保守性多于进步性，妥协性多于反抗性，不是革命派而是改良派。但他也认为孔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不过不像郭老估計得那么高就是了。

关鋒和楊荣国对春秋社会性质的看法是和郭老基本上相同的，也认为是由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的过渡；但是他們认为孔子所代表的阶级是奴隶主阶级，因而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他們认为郑国子产是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因为他积极主张废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而孔子則和老子一样，都是旧制度的维护者，反对社会进步，企图倒轉历史車輪。

馮友兰等人对社会历史分期问题的看法，大体上仍不外乎郭老和范老的意见，但对于孔子的评价，却存在着若干问题。这些，我准备留待后面去讲。

王船山的时代也有它的特点。如前所说，王是明末清初人，他在明代生活了二十多年，之后，又作为明末遺民在清代生活了四、五十年。这个时代也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按照黃宗羲的说法，是所謂“天崩地解”的时代，顧炎武則认为当时“已居不得不变之势”。这时期的社会矛盾也很尖锐，既有阶级斗争，又有民族斗争，两种斗争都很剧烈，而且交错在一起，互为消长。

我們知道，明末的阶级斗争是非常剧烈的。当时，赋稅苛重，土地集中，农村人口大批逃亡，社会处于极不安宁的状态。《明史·王宗沐传》上有一段話說“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絲粟皆空”，描繪了这个时候民生凋敝、社会經濟极度破坏的景况。万历以后，农民起义已不断发生，到了崇禎年間，就汇合成为李自成、张献忠的大起义。而在統治阶级内部，閹党和东林党之間也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至于民族矛盾，自从努尔哈赤在关外建立后金并且迅速发展以

后，也变得越来越紧张了。

但是，这两种矛盾也还有一个变化交替的过程。一六四四年是一个轉折点。这一年，李自成率領农民起义軍攻克北京城，宣判了明王朝的死亡；同时，这一年地主阶级把清兵引进了关内。我以为，在清兵入关以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表现为以明廷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和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之间的激烈斗争，结果是农民打败了地主，明朝被推翻。但清兵入关以后，情况就起了变化。这时，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并且很快地轉化成为主要矛盾。

清兵入关并不像有的同志所说的那样和平，他们对汉族地区烧杀得很厉害，矛盾十分尖锐。就拿河北的圈地来说，对农民的损害也已够严重的了。所以，李自成和张献忠的余部后来几乎都是坚持抗清斗争的。地主阶级则一部分坚持斗争，一部分投降清朝。我不同意刘大年同志的意见，他认为投降清朝的是中、小地主，坚持斗争的是大地主。吴三桂、洪承畴都是大地主，还不是都投降了！

在清兵入关以后的数十年間，民族矛盾一直大过于阶级矛盾。李自成、张献忠的余部坚持抗清斗争有二十年之久。直到一六六一年南明政权灭亡以后，川东地区仍然有李来亨等坚持斗争。一六八四年清軍攻占了台湾，郑氏政权最后失败，清政府才算完成了对全国的軍事征服。但这时候离清兵入关已有四十年了。我以为在清初，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至于到底經過了多少年，是二十年还是三十年，又轉为以阶级矛盾为主，那是可以研究的。要不然，王船山的思想就很难得到解释了。当时有很多进步思想家都是坚决主张抗清的，他们本人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但却坚持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主张反滿。王船山就是其中的一个。正是由于在反清的斗争中遇到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所以他的思想才获得发展。也可以說，他思想的光辉，是在反清的斗争中磨练出来的。

在这个时期，清朝的統治方法和政策，也有一个轉变过程。开始是实行武装鎮压，搞圈地，以后，不圈地了，采用了“一条鞭”法。而为了籠絡地主階級知識分子，还搞了科举制度。諸如此类，花样很多。在中国历史上，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建立全国性政权的，有元、清两个朝代。但清朝的統治方法最为高明。它吸取了蒙古人統治中国的經驗，采取学汉統治汉，学蒙統治蒙的办法，逐渐制定了一套基本上同汉、蒙各族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状况相适应的政策，以稳定局面，使民族矛盾慢慢地緩和下来。

王船山生于明末而死于清初，正經歷着社会矛盾从以階級矛盾为主向以民族矛盾为主的轉化，变动是很大的。他的思想就是这个变动的产物，反映了时代。有人把“天崩地解”理解为資本主义萌芽，并认为王船山的思想代表了市民階层的利益。我看不一定。当时，在东南沿海地区，資本主义萌芽是有的，但主要是在經濟領域中有所反映，在政治上、文化上的反映还不多。我认为在王船山的思想里关于資本主义萌芽的反映很少，而重农抑商的主张却很明显，所以他基本上还是一个封建地主階級的思想家。

以上，我讲了孔、王两人各处的时代背景。总起来說，春秋和明末清初这两个时代都可以說是大变动的时代，是出思想家的时代。两大思想家就产生于这两个大变动的时代，因而，他們的思想也各自反映了时代的变化。时势造英雄，有什么样的时代也就有什么样的思想家。

（二）王船山的生平和思想

王船山（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年），本名王夫之，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州（今衡阳）人。家庭出身是地主，但他家究竟有多

少土地則不大清楚。关于他的一生，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发奋讀書，以应科举，求功名。这是他二十五岁以前，即清兵入关以前的基本状况。王船山从小讀書很聪明，很用功。据說他七岁的时候就已讀完了《十三經》。这虽有些夸大，但也說明了他在年青时候即以才学聞名。他学过文学、音韵，讀过經史，涉猎的范围很广，对历史尤有研究。从他以后留下的著作来看，历史、哲学、文学等各方面的都有。十四岁，他考上了秀才；二十三岁，他和他大哥同时考中举人。接着，他父亲就叫他們兄弟俩取道南昌，去北京等候考进士。但这时明王朝在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軍的打击下，已面临着最后崩潰的局面。北上的道路已經阻塞不通，他們的家乡湖南又处在动盪不安的状态中，于是，兄弟俩又从南昌返回了家中。不久，张献忠部攻克了他們的故乡——衡州，并逮捕了他們的父亲。张献忠要求王氏弟兄参加农民政权，并以此作为释放他們的父亲的条件。这件事情使他們很为难。王船山在这种情况下施用了“苦肉計”，他故意把自己的脸和手腕刺破，好像受了重伤，叫人抬到张献忠那里去。张献忠释放了他父亲。不久，他自己也逃了出来。这說明他是不同意农民起义的，他的思想也不会是代表农民利益的。

第二阶段：参加政治活动和民族斗争。这一段所包括的时间是从清兵入关（一六四四年）到南明政权灭亡（一六六一年），約相当于他二十五岁到四十多岁。他在衡州参加过一次抗清武装起义，失敗了；具体情况不清楚。后来，他参加了南明政权，頗想有所作为，提出了很多主张。他抗清很坚决，在南明政权內是个有正义感的人物。可是南明政权一直也沒有容納他的建議，他被排挤了，离开了南明，而清朝又到处捉拿他，于是，在湖南过了一段流亡生活。

第三阶段：隱居著书。这一段的时间是从南明亡（一六六一年）

开始，到他死为止，約相当于他四十多岁到七十岁以后。这时候他看到明朝江山已經恢复无望，就退而杜門著书，定居于衡州石船山中。船山先生之名即由此而来。在这二、三十年中，他写了很多东西，据統計，不下八百万字，有数百卷之多，质量一般都比较高，提出了一些新問題。在中国历史上的著作家中，他可算得著作最多的一个了。他的书很少有人全讀过。过去学者，以梁启超讀書最多，但也沒有讀完王的著作。孔子留下的言行录《論語》一共才一万三千七百余字；比較起来，王船山的著述就十分可觀了，但可惜的是后来散失了一小部分。这些书到他死后才陸續印行。

讲王船山的经历是为了說明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人说他代表农民，我看不是，因为他反对农民起义。也有人说他代表市民，我看也不是。当时中国虽已有資本主义萌芽，但主要是在江浙沿海地区，湖南生产力比較落后，还談不上；而且王船山也沒有多少市民思想。討論会上比較一致的意見是认为他代表地主阶级，我也是这样看。他的生平经历和著作，都表明他是一个地主阶级的知識分子。

但在会上也还有一种奇怪的说法。有人主张王船山既不代表农民，也不代表地主。他說，对于大思想家，我們不能說他是某个阶级的代言人；阶级是狭隘的东西，为阶级利益奔忙的人，不可能在学术上有多大成就，只有超阶级的人，才能有广阔的視野。所以他认为王船山是超阶级的、能通觀全局的士大夫。这种說法誠然荒謬，但却有一定的代表性。有些人在分析古代思想家、文学家时总是愛說他們代表士大夫；而士大夫在一些旧知識分子心目中又往往是超阶级的，似乎是不食人間烟火、飘飘欲仙的一流人物。这在过去的文学史上，給我的印象尤为深刻，好像他們就是飲酒、賦詩，清高得很。这也是一个思想問題。

关于王船山的思想，我想只介紹一下政治、哲学、历史等几个

方面，其他如文学、科学方面的成就，就不去讲了。

一、政治思想：最突出的是爱国主义思想，讲究民族气节。王船山在民族敌人面前始终不屈，抗清失败后流亡于湘西山区，以后是隐居著书。他的后半生很穷困，有时甚至著书没有笔墨，写字用破纸，但他决不在清朝做官；在他的一生中，始终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民族思想。他的文学作品中有个剧本叫《龙舟会》，是根据唐人小说中的一个故事写的。女主角是谢小娥。她的父亲和丈夫在经商途中被强盗所杀。小娥立志报仇，最后把强盗杀了。在改编为剧本的过程中，王船山赋予这个故事以强烈的民族意识。在唐人小说中，父亲和丈夫本没有名字，他给他们取名为“谢皇恩”和“段不降”，把强盗比作满人，用一家的仇恨来比喻君父之仇，最后由小娥报了这个仇。看来王船山是想通过这个剧本把报仇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

在王船山的许多史学著作中，如《读通鉴论》和《宋论》等，都反映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他特别反对让所谓“夷狄”来统治中国。他说：

“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

何也？信义者，人与人相与之道，非以施之异类者也。”（《读通鉴论》卷四）

“可禪，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间之。”（《黄书·原极》）

他认为义“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读通鉴论》卷十四），而罪人亦有“一时之罪人，一代之罪人，万世之罪人”（同上书，卷二十九）。“古今通义”就是“夷夏之分”，是万世不变的，所以投降外族的就是“万世罪人”了。李林甫、桑维翰都是历史上的罪人，但李是一世之罪人，而桑则为“万世之罪人”；因为李是唐代权臣，主张重用番将，酿成“安史之乱”，而桑却为了

助石敬瑭称帝，亲赴契丹乞援，割让了燕、云十六州之地。

所以，从王船山的生平和思想可以看出他的反满思想十分强烈。有人提出，王的民族观点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诚然，王船山的民族观点是有历史局限性的。但大家还是认为，在当时讲民族大义、民族气节还是好的。王基本上是爱国主义者，不必给他乱扣帽子。

对于农民，王船山主张轻役薄赋，减少剥削，保护农业生产，重农抑末。在土地制度上，他反对把土地看作帝王的私产，而主张应归耕者所有，他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是对的，但“莫非王土”则不可，因为土地是天生的，“有其力者治其地……不待王者之授之”（《噩梦》），“王者虽为天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貪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土乎？”这种思想在当时是进步的。

二、哲学思想：可以说，在我国封建社会里，他达到了唯物主义的最高峰，而且，涉及的范围很广，贯穿到许多方面。清末的谭嗣同、章太炎都没有能够超过他。但我研究不够，不能全面介绍，只能大概说一说。

王船山的唯物主义思想，在他的《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尚书引义》、《思问录内外篇》和其他许多著作中，都表现得极为明显。我们知道，在中国哲学史上有所谓“理、气”和“道、器”的问题。大体上“气”和“器”就是指物质，而“理”和“道”则是精神；主张“气”、“器”为第一性，“理”、“道”为第二性的是唯物主义，反之，是唯心主义。宋、明以后的哲学家主要就是围绕这问题展开争论的。王船山在“道”和“器”的关系上主张“器”先于“道”。他在《周易外传》中说：“天下唯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他认为“无其道则无其器”的说法不对，应该是“无其器则无其道”。他还举了许多具体事例进行论证：“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

道者多矣。未有弓矢而无射道，未有車馬而无御道，未有牢、醴、璧、帛、钟、磬、管、弦而无礼乐之道；則未有子而无父道，未有弟而无兄道，道之可有而且无者多矣。”由此可見，王船山是认为先有具体事物“器”，然后才产生这些事物所具有的道理“道”。这完全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解釋。

在“理”“气”关系的問題上，王船山肯定“气”为第一性的，“理”为第二性的，得出了理依于气的結論。他說：“气者，理之依也”（〈思問录內篇〉）；又說：“若其实則理在气中，气无非理。气在空中，空无非气”，等等。

从以上所举的一些命題看来，王船山的唯物主义思想确实是很明确的。在他的其他一些著作中，这种思想还有反复的說明，我們不能遍举了。

其次，王船山思想里面的发展观念也是比較明确的。例如，他說：“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思問录外篇〉），即天地的大道虽不变，但天地間的事物却日日在变；还說：“靜者靜动，非不动也”（〈思問录內篇〉），“靜即含动，动不舍靜”（〈思問录外篇〉），即动是絕對的，靜是相对的。他还批判地修正了张載“日月之形万古不变”的論点，他认为物質的变化有些虽不易觉察，但實質上还是在变化，所以他強調“日新之化”。他說：“江河之水，今犹古也，而非今水之即古水。鑪烛之光，昨犹今也，而非昨火之即今火。水火近而易知，日月远而不察耳。爪发之日生而旧者消也，人所知也。肌肉之日生而旧者消也，人所未知也。人見形之不变而不知其質之已迁，則疑今兹之日月为遼古之日月，今兹之肌肉为初生之肌肉，恶足以語日新之化哉！”（〈思問录外篇〉）應該說，这种思想是很光輝的，在古代哲学史上是不可多得的。

甚至，还可以說他有物質不灭的思想。例如，他认为可以把事